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周邦彦词选

檀作文 邹佳茹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周邦彦词选

檀作文 邹佳茹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邦彦词选/檀作文,邹佳茹撰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8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ISBN 978-7-100-15461-1

I.①周… II.①檀…②邹… III.①宋词—选集
IV.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3565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周邦彦词选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檀作文 邹佳茹 撰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461-1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%

定价:24.00 元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编 委 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

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

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

策 划 厚艳芬

走出学术象牙塔

刘跃进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。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，但精品甚少。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，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；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，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。这样一种偏见，必须改变。

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，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，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。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、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，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。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，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，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。近来翻阅《王伯祥日记》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、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三曹诗选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诗选注》的工作，印象深刻。每一部书的编纂，从篇目的确定，到注释的推敲，都经过反复打磨。然后内部油印，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、高等院校，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。经过这样几个回合，才最后定稿，公开出版。这样的书，阐释经典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，多数印行在数

十万册以上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，也逐渐走出学术圈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。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之一，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说易行难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指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门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。”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，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。没有普及，何来提高？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。现在，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，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。这种观念值得商榷。毫无疑问，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，给予尊重，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，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，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，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道理不言自明。但同时，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，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广大所认知。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，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、依靠群众。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，那就成了无根之木，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。这道理不言而喻。

启示之二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。康德《逻辑学讲义·导论》说过：“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。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

人，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。”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。提高在前，普及在后。普及不是随意发挥，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。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，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。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哪来生动的普及？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。对学者而言，深入易，浅出难。浅出所以难，是对作者要求高，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，才不至于把经念歪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，而要讲给大众听，就无法藏拙。因此，做好普及工作，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积学储宝、研阅穷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，也才会更有意义。

启示之三，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，更是传递一种理念，一种理想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。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，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，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文学研究工作者，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，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。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，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“古

代诗词典藏本”，恰逢其时，其意义自不必多说。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们以“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”为追求，其选家皆术有专攻，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，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。

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、研究特点不同，因此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，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。这里仅举数例：李山教授的《诗经选》，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“诗经世界”的新旅——重新审读其字句、篇章，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，勾勒其礼乐背景，体味其文化意蕴，欣赏其风雅艺术，考察其歌唱方式……《王维诗选》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，王维诗乃诗之哲学，亦可谓哲学之诗。故其选评，敏于感悟，精于赏玩；其评赏文字，巧于切入，工于辞采。《李清照诗词选》的作者陈祖美先生，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，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“心事”——幼年失恃、党争株连、婕妤之叹，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，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。

无须赘言，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，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。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，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，这一点，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。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特别强调自己“注”的特色，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。希望这种不拘一格、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，贯彻丛书始终，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，既不乏前沿理论、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

品选本。

丛书付梓在即，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，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，这种信任让我感动。确实，好书好序，相得益彰。如果翻开一部新书，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，就好像刚出门，便遇上障碍物，诚可谓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，叫人眉蹙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早就告诫：“凡书有所发明，序可也；无所发明，但纪成书之岁可也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贸然作序，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想，好书确实需要介绍，好意也要有所表达。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。

六十年前，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，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，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，取得空前成就，影响至今。我们相信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

2014年5月30日

草于京城爱吾庐

导 言

一

北宋词人周邦彦，字美成，晚号清真居士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

周邦彦虽然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力量的词人之一，但是关于他的生平资料，却不是很多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《东都事略·文艺传》《咸淳临安志·人物传》三书皆为周邦彦单立小传，但篇幅都很短，只记其生平大概，至于细节，则语焉不详。宋人笔记小说，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、庄绰《鸡肋编》、王明清《挥麈录》《玉照新志》、陈鹄《耆旧续闻》、张端义《贵耳集》、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等，皆记周邦彦风流韵事，然而多不足信。以上数种周邦彦生平资料及传闻故事，彼此之间又多有出入。20世纪以来，有数位学者对周邦彦的生平做过专门考证，其中较有成绩的有以下数种：王国维《清真先生遗事》，陈思《清真居士年谱》，罗忼烈《清真年表》，薛瑞生、孙虹《清真事迹新证》。四者之间，意见亦有不同。今据罗忼烈《清真年表》，略叙周邦彦生平如下：

周邦彦生于北宋仁宗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卒于徽宗宣

和三年（1121），享年66岁，经历了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。其生平仕宦可考者约有以下数端：

周邦彦约在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24岁时，入汴都为太学生。元丰六年（1083）七月，28岁时，献《汴都赋》，得到神宗赏识，被提拔为太学正。宋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）春，32岁时，出任庐州（今安徽合肥市）教授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38岁时，知溧水县，绍圣三年（1096）任满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42岁时，调还汴都，任国子主簿。元符元年（1098）六月十八日，哲宗皇帝召对崇政殿，43岁的周邦彦重进《汴都赋》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周邦彦46岁，迁校书郎。崇宁三年（1104），49岁，迁考功员外郎。大观元年（1107），52岁，迁卫尉宗正少卿，兼议礼局检讨。政和元年（1111），56岁，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。政和二年（1112），57岁，以奉直大夫直龙图阁知隆德军府（府治今山西长治市），并管勾学事。政和五年（1115），60岁，徙知明州（州治今浙江宁波鄞州区）。政和六年（1116），61岁，回汴都任秘书监。政和七年（1117），62岁，进徽猷阁待制，提举大晟府。重和元年（1118），63岁，出知真定府（府治在今河北正定县）。宣和元年（1119），64岁，改顺昌府（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市）。宣和二年（1120），65岁，徙知处州（州治在今浙江丽水市），不久改任，提举南京（今河南商丘市）鸿庆宫。这一年，周邦彦曾在睦州（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）居住。方腊在睦州清溪起事，周邦彦搬到杭州。杭州不久失陷，周邦彦避

地扬州。宣和三年（1121），66岁，正月赴鸿庆宫，过天长（今安徽天长市），至南京，卒于鸿庆宫之斋厅。

从周邦彦的仕宦经历来看，前期相对蹉跎，后期较为顺利。周邦彦46岁以后，也就是宋徽宗时期，官做得大一些。但无论前期、后期，周邦彦都是做地方官的时间居多，做京官的时间很短。

周邦彦的仕宦生涯，主要在北宋哲宗、徽宗时期。其前期正值新旧党争之时，而周邦彦仕途坎坷，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周氏拥护新法而为旧党所难容。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。周邦彦的文章及相关资料，不能证实他在政治上隶属新党集团。但是宋徽宗时期，周邦彦却与蔡京集团的人交往甚密。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卷一记载周邦彦曾经写诗祝贺蔡京生日，歌颂蔡京“化行《禹贡》山川内，人在周公礼乐中”。周邦彦与蔡京集团的刘昺关系更为亲密，据庄绰《鸡肋编》一书记载，他曾经为刘昺的祖父写过一篇墓志铭，并拒收高额润笔费，刘昺对此十分感激，无以为报，便举荐周邦彦代替自己出任户部尚书。周邦彦在宋徽宗时期，位至列卿，和蔡京集团的提拔有很大关系。因蔡京集团臭名昭著，所以有人批评周邦彦是没有政治操守的无良文人。

周邦彦晚年固然与蔡京集团的人有交往，蔡京集团的人也确实举荐和提拔过他。但仅仅据此就批评周邦彦缺乏政治操守，则失于武断。周邦彦毕竟只是个文人，而非政客。无论是身前的自我认同还是后人的评价，周邦彦都不是一个政客。两宋时期的大文人，大多与政治关系密切。北宋

的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，南宋的辛弃疾、陈亮，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，且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。周邦彦和他们不同。周邦彦的策略是淡化政治立场并远离政治。总的来说，周邦彦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。他绝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，也没有太多治国平天下的抱负。他的自我定位是文人和艺术家。周邦彦为官多年，但从未担当过重要职位，不足以对朝廷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周邦彦做过很多任地方官，也无政绩可言，固然不能说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贡献，但他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实在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文官。这一点，他自己，以及同时代的人，也都很清楚。即使是仕宦生涯，周邦彦也是因为文学才能而被朝廷赏识。他一生中三次比较大的机遇，都和文学艺术才能有关。元丰六年（1083）七月，周邦彦28岁，第一次献《汴都赋》，得到宋神宗赏识，被提拔为太学正。元符元年（1098），哲宗皇帝召对崇政殿，周邦彦重进《汴都赋》，除秘书省正字。这两次机遇，都是因为《汴都赋》。宋徽宗政和七年（1117），周邦彦提举大晟府，则是因为他在音乐方面的特殊造诣。周邦彦本就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，他不是政治家，我们也不必在政治方面苛责于他。

二

周邦彦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词作，没有多少政治色彩。他的词，主要写艳情和羁旅。

周邦彦的词作，多写艳情相思主题。周邦彦极富文学与音乐修养，每每以“顾曲周郎”“旧日潘郎”自居，他自己在作品里又老是说：“大堤花艳惊郎目”（《玉楼春》）；“有流莺劝我，重解绣鞍，缓引春酌”（《瑞鹤仙》）；“长记那回时，邂逅相逢，郊外驻油壁”（《应天长》），这就难怪后人将他作风月场里的风流才子，将很多香艳的故事附会到他身上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和洪迈《夷坚志》里都说：周邦彦在苏州时，和歌妓楚云相好。周邦彦再到苏州时，楚云已嫁人，周邦彦在苏州太守家见到楚云的妹妹，写了一首《点绛唇》：“辽鹤归来，故乡多少伤心事。寸书不寄。鱼浪空千里。凭仗桃根，说与凄凉意。愁无际。旧时衣袂。犹有东门泪。”楚云读到这首词，伤心痛哭。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卷二里说周邦彦任江宁府溧水县令的时候，和溧水主簿的妻子关系暧昧，他的慢词名篇《风流子》就是写这件事的，该篇中的“新绿”“待月”，都是主簿家里的亭轩之名。王明清还在《挥麈余话》卷二及《玉照新志》卷二里，说周邦彦晚年所写的《瑞鹤仙》一词中的“凌波步弱，过短亭，何用素约”，是与乡人侍妾相遇。陈鹄《耆旧续闻》、张端义《贵耳集》、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三书，都记载了周邦彦与李师师、宋徽宗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，说李师师爱慕周邦彦，宋徽宗因此贬斥周邦彦，周邦彦词中名篇《少年游》（并刀如水）、《兰陵王》（柳阴直）都是为李师师而作。这些故事，自然是小说家言，附会成分居多，不能当真。王国维在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一文中感慨：“先生立身颇有本末，而为乐府

所累，遂使人间异事皆附苏秦，海内奇言尽归方朔。”认为那么多香艳风流的故事都附会到周邦彦身上，无非是他填词惹的祸。但周邦彦的艳情词，透露出的信息是他总是流连于秦楼楚馆、门户人家（宋人管娼妓居所叫“门户人家”），同时代的人将那么多风流故事附会到他身上，也不是空穴来风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说他“疏隽少检，不为州里推重”，《东都事略·文艺传》说他“性落魄不羁”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生活放荡不羁、喜欢写淫词艳曲的风流才子形象。大概正是因为风流放荡、不拘小节的缘故，青壮年时期的周邦彦，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。周邦彦似乎也不看重主流社会的评价。在他看来，青楼女子的知遇，远比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有价值。周邦彦写过一篇《玉楼春》：“大堤花艳惊郎目。秀色秾华看不足。休将宝瑟写幽怀，座上有人能顾曲。平波落照涵赭玉。画舸亭亭浮淡渌。临分何以祝深情，只有别愁三万斛。”女子的青春和美艳，带给周邦彦无尽的享受和安慰。妙赏深情的词人，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了无数美丽的篇章，歌颂这些灵秀而美丽的女子。

周邦彦的词作，艳情相思之外的另一个主题是羁旅惆怅。他的作品中，羁旅惆怅与艳情相思，两种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。周邦彦一生，为京官日短，做地方官的时间比较长，这就造成他的内心有贬谪羁旅之愁。尤其是自太学正外放庐州教授和溧水县令这段时期，人到中年的周邦彦颇有贬谪情怀。任溧水县令期间，他写过一首《满庭芳》词，词里说“凭栏久，黄芦苦竹，拟泛九江船”，便是以

贬官江州司马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比，词里又说“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”，便是说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白居易诗里所说的“住近湓江地低湿”差不了多少。他在这篇作品中感叹自己是“憔悴江南倦客”，内心满怀贬谪悲苦。贬谪往往造成情人间的分离，情人间的乖隔反过来又加剧了词人内心的羁旅惆怅。因此，周邦彦的词里总是多今昔对比，且往往是昔日情人欢会，今日相隔千里。他在词里总是说：“当时相候赤栏桥，今日独寻黄叶路”（《玉楼春》），“去年胜赏曾孤倚……今年对花最匆匆”（《花犯》）。周邦彦是爱怀念的人，往日对他来说意味着美好，意味着情人之间的耳鬓厮磨，他总是在追忆那些美好的日子。光阴便在追忆中流逝，年华老去，萦绕在内心的是“年华一瞬”（《过秦楼》）和漂泊羁旅的惆怅。周邦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，而情感生活又过于丰富，甜蜜而复酸辛。长年的羁旅漂泊和情感消磨，使得他的内心对时光的流逝异常敏感，这为他的大多数作品奠定了感伤的基调。他的慢词名篇，尤其如此。譬如他的名篇《六丑·蔷薇谢后作》：

正单衣试酒，恨客里、光阴虚掷。愿春暂留，春归如过翼。一去无迹。为问花何在，夜来风雨，葬楚宫倾国。钗钿堕处遗香泽。乱点桃蹊，轻翻柳陌。多情为谁追惜。但蜂媒蝶使，时叩窗隔。东园岑寂。渐蒙笼暗碧。静绕珍丛底，成叹息。长条故惹行客。似牵衣待话，别情无极。残英小、强簪巾幘。终不似、一朵钗头颤袅，向人欹侧。漂流处、莫

趁潮汐。恐断红、尚有相思字，何由见得。

便是充满了羁旅、追忆的叹息。

周邦彦基本上是一个活在个人情感世界里头的词人。他不习惯在词里发表政见，他的词作，基本看不到当时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子。但他的某些词作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。譬如，其《应天长·寒食》词里说：“长记那回时，邂逅相逢，郊外驻油壁。又见汉宫传烛，飞烟五侯宅”；《琐窗寒》词里说：“嬉游处。正店舍无烟，禁城百五。旗亭唤酒，付与高阳俦侣”，都对北宋晚期汴都寒食冶游风气有所反映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云：“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，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。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愁，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”周邦彦的词和孟元老的笔记小说，可以互为佐证。周邦彦的《瑞鹤仙》（悄郊原带郭）一词，虽未必如王明清所说，事先预料到方腊起义，但“叹西园已是，花深无地，东风何事又恶”数句，确实是对方腊起义前夕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局势的一种暗示。

三

周邦彦的词在宋代就有很大影响，表现在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。

南宋人强焕在周邦彦任溧水县令八十多年后，也做了溧